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 编

21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

白重恩

21世纪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蒂莫西·贝斯利

日本的环境保护

季卫东

中国的污染税制度

劳伦斯·古尔德

生命周期理论和中国的居民储蓄

弗兰科·莫迪格里亚尼

金融深化

清泷信宏 约翰·穆尔

非理性行为的法和经济学

弗农·史密斯 弗朗切斯科·帕里西

美欧公司丑闻差异的股权解释

小约翰·科菲

中国城市的金融生态研究

李扬, 刘煜辉

解读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李波



中 信 出 版 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 编

21



中 信 出 版 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 21 / 吴敬琏主编.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5.11

ISBN 7-5086-0497-0

I. 比… II. 吴… III. 比较经济学 IV. F0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25582号

比较·第二十一辑

主 编: 吴敬琏

责任编辑: 肖 梦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5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6-0497-0/F·939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 ◆ ◆

主 编：吴敬琏

编委名单（按拼音排序）：

崔之元	高世楫	郭树清
焦津洪	李剑阁	林毅夫
楼继伟	卢 迈	钱颖一
荣敬本	王则柯	吴敬琏
吴晓灵	谢 平	许成钢
张春霖	赵人伟	周小川

◆ ◆ ◆

责任编辑：肖 梦

◆ ◆ ◆

《比较》是为读者提供的一个有关比较制度分析的学术性平台。《比较》站在理论前沿，根据中国经济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有选择地介绍别国的经验和教训、转轨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比较研究领域的发展，同时，有针对性地介绍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设计、政策建议和评论。

◆ ◆ ◆

中信出版社《比较》编辑室
电子邮件: bijiao@citicpub.com
联系电话: (010)85322632
邮购传真: (010)85322631

卷首语

岁末又至，回顾今年的中国经济，大家讨论最多的恐怕是中国经济的新转型。20多年的高速增长，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2004年中国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位居世界前列，而且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人均GDP提高了约8倍，有4亿多人脱离贫困状态。但是，中国经济的内外矛盾日益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掣肘：产业结构急待调整；高速增长的环境代价正在显现；资源瓶颈在今年宏观经济过热中得到充分体现；地区差异、城乡差距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随着融入全球经济进程的加快，世界经济环境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也将加大……如何对我们观察到的这些问题进行“理性的深入分析”、制定“基于证据的政策”是本辑《比较》要和读者们共同讨论的话题。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根据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白重恩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中国和谐发展：产业·环境·制度”（2005年9月27~28日）国际研讨会的发言稿整理而成。作者在文中考察了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和发展中面临的诸多挑战：GDP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经济发展和增长中的政策效益，例如，如何设计所得税税率使之既能达到平抑收入差距的作用又能容易地征收，如何通过研究收入分配和福利之间的关系来制定合理的公共福利政策，不同地区的城市化经验能否移植、政府和市场在城市化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以及如何通过发展服务业、减少创业障碍、改善金融制度等等来促进就业。该文是作者近来对这些问题所做的初步思考，因此问题显然多于答案。然而，正如作者指出的：“我们应该对观察到的一些经济问题做理性的深入分析，并基于这种分析来制定有效的政策。特别是在提供公共福利方面，我们必须结合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具体情况做出具体的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做出冷静、理性、可持续的政策决定。”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蒂莫西·贝斯利在清华大学“中国和

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发表了题为《21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的演讲,我们把它整理成文,献给读者。作者在文中通过制度、机会和自由化这三个宽泛的主题,来反思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即二战后的国家主导型发展战略和8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的华盛顿共识;思考经济发展中的增长和减贫问题。作者认为,在制度、机会和自由化这三个领域的研究可以挑战现有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影响许多国家的政策争论,同时还有助于我们“以更加统一的方式来看待不同国家面临的挑战,了解背景迥然不同的国家如何在特定时间段内根据这三个主题的重要性来寻找自己的发展模式。”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也是作者特别强调的问题,他论述了跨国数据、跨地区数据和微观数据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和各自的不足,提出了“基于证据的政策”概念。

邻国日本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它的经济成功和失败都是极好的教益,那么在环境保护方面也是这样吗?读者可以到“比较之窗”栏目,看一看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季卫东的《从行政规制到利益诱导》一文。文章介绍了日本自50年代以来环境治理的演进过程,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作者认为,日本“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行政规制和经济调节这两种基本的思路,而缓和规制、加强经济杠杆作用是近年来以及今后发展的总趋势;在考虑法律的作用的时候,应该把这一核心反映到有关的制度设计之中去。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经济调节方式主要有三种:环境使用权、环境税以及排放配额。这三种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灵活机制,是关键的制度化的支点。”

如何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来治理环境,对于中国来说,仍然是一个十分欠缺的领域。《比较》曾在第20辑中推出了概论性的四篇文章。今年9月27日到28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召开的“中国和谐发展:产业·环境·制度”国际研讨会上,国内外学者就环境治理的制度和机制设计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本辑《比较》特意选取了斯坦福大学教授劳伦斯·古尔德针对中国污染治理的《中国的污染征税制度:理论能力和现实挑战》一文,这是作者在发言基础上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修改和补充而成的。文章从激励和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比较了污染税和强制性技术指标以及技术促进政策的效果,认为中国现行污染税制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包括为有效利用减污渠道提供激励;为政府创造有效的收入来源等,但是现行的污染税制度既存在执行不力的问题,也无法替代技术促进政策解决知识溢出效应这样的市场失灵,因此中国在推行污染税制度的同时,也有必要推进技术

促进政策。

《生命周期理论和中国的居民储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迪格里亚尼未完成的遗稿，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左学金教授推荐给我们。生命周期理论是莫迪格里亚尼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之一。在该文中，莫老利用生命周期理论研究了1953~2000年间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的变化，并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未来变化做出了预测。他认为，“中国的储蓄率已经过了最高点。中国的赡养率已迅速下降到那些增长缓慢国家的水平，已经没有进一步的下降空间。至于收入增长率，我们很难想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加快或持续保持现有的高速度。”需要说明的是，英文原稿没有标题，是我们根据文章内容加上的，稿中还有一些作者自己加的评注和尚未形成定论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在“前沿”栏目中，是《比较》于2003年推出并一直在跟踪的两位作者——伦敦经济学院清洸信宏和约翰·穆尔教授的《金融深化》一文。两位作者提出了两个衡量金融深化的创新性概念：“有限的双边承诺”和“有限的多边承诺”，它们分别用 θ 和 ϕ 两个参数来表示。然后，作者将这两个参数纳入一个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来研究金融深化的三个不同阶段，同时还研究了这些参数值的长期变动对投资、产出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等指标的影响。本文与传统金融深化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更多的是一个经验和实证分析理论，它强调外生的金融结构和金融中介的作用；相反，本文则是一个基于宏观分析框架的规范理论，金融结构和金融中介是内生于经济的。对于金融深化的三个阶段，有兴趣的读者也可对照研究一下中国处于哪一个阶段。

从读者的反馈中，我们了解到有不少读者对《比较》的“法和经济学”栏目非常关注。在本辑《比较》中我们提供给读者两篇文章。《非理性行为的法和经济学》是介绍法和经济学最新研究方向的文章，作者分别是法和经济学领域的新秀弗朗切斯科·帕里西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两位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学者们如何将心理学和其他行为科学的成果融合起来，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定进行重新审视，并将之应用于分析法律和制度设计问题。作者指出，“这将是一个十分令人着迷的领域，而且很有可能为法律和制度构建工作提供一系列政策建议。学者们朝这一研究方向的努力，向读者展示了一些法律和经济学理论方面最激动人心的进展和相关的政策含义。”

近年来，美欧公司丑闻频频爆发，但是在两地的表现却有显著差异：在美国，大多数公司丑闻都与公司财务和会计异常有关，尤其是操纵盈利；而在欧

洲，公司丑闻更多的是与滥用控制权有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小约翰·科菲在这篇《美欧公司丑闻差异的股权解释》中，从公司治理体系的差异角度对此给出了解释：在美国，股权分散的公司治理体系容易滋生各种形式的盈利操纵。相反在欧洲，股权集中体系下的公司往往出现大股东滥用控制权的情形。因此，作者指出，公共政策制定者有必要认识到，某一体系下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到另一体系中未必管用。更重要的是，应当设计出不同的市场中介机构，在有差别的体系中监测异常、守望正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李扬和刘煜辉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研究：理论与方法》一文是中国人民银行委托的重点课题“中国金融生态环境研究”的课题总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作者以我国金融生态的地区差异为立足点，剖析了影响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的九大因素：经济基础、企业诚信、地方金融发展、法治环境、诚信文化、社会中介发展、社会保障程度、地方政府公共服务、金融部门独立性。作者度量了九大因素在金融生态环境中不同的作用，结果表明，“城市法治环境、地区经济基础、地方金融发展、金融部门独立性和诚信文化等五项因素的贡献弹性总和达到75%左右，足见它们是决定城市金融生态环境优劣的最重要因素”。根据这些影响因素的不同作用，作者还提出了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人民银行于今年7月21日调整了人民币汇率，使有关人民币汇率是否有必要升值的争论暂时划上了一个句号。对于这次调整，虽然基本的评判比较一致，但仍然有不同的具体解读。李波在《投机性攻击、货币升值危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中，从投机性货币攻击和货币升值的角度解释了人民币汇率调整。是一篇集文献综述和评论为一体的文章。

目 录

Contents

第二十一辑

- 1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 白重恩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by Bai Chong-en*

CCWE专栏

CCWE Column

- 11 21世纪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制度、机会和自由化 蒂莫西·贝斯利
Development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Institutions, Opportunity
and Liberalization *by Timothy J. Besley*

比较之窗

Comparative Studies

- 31 从行政规制到利益诱导：日本推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法制手段
季卫东
Legal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Japan *by Ji Weidong*

CIDEG专栏

CIDEG Column

- 43 中国的污染征税制度：理论能力和现实挑战 劳伦斯·古尔德
China's Pollution Levy System: Theoretical Capabilities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by Lawrence H. Goulder*

海外特稿

Special Features

- 65 生命周期理论和中国的居民储蓄 弗兰科·莫迪格里亚尼
Life Cycle Hypothesis and China's Household Saving
by Franco Modigliani

前沿

Guide

- 95 金融深化 清泷信宏 约翰·穆尔
Financial Deepening *by Nobuhiro Kiyotaky and John Moore*

法和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

- 109 非理性行为的法和经济学 弗朗切斯科·帕里西 弗农·史密斯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Irrational Behavior
by Francesco Parisi and Vernon Smith
- 118 美欧公司丑闻差异的股权解释 小约翰·科菲
A Theory of Corporate Scandals: Why the U.S. and Europe Differ
by John C. Coffee, Jr.

改革论坛

Reform Forum

- 135 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研究：理论与方法 李扬 刘煜辉
Research of Financial Ecology in Chinese Citie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by Li Yang and Liu Yuhui
- 191 投机性攻击、货币升值危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李波
Speculative Attack and the Reform of RMB Exchange Rate Regime
by Li Bo

读者来信

- 204 对“经济生活中的政府管制”一文的一个注解 高世楫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

白重恩

众所周知,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仅要看GDP,还要看许多其他方面。今天我们要回顾一下过去20年中国在其他方面取得的成绩如何。另外,大家经常谈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收入不均”,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些什么样的证据?又该如何理解这些证据?我们要处理“收入不均”问题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关于这些政策我们知道些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又是些什么?由政府提供某些公共服务的程度应该有多深,和收入分配之间有什么关系?很多人研究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政府提供服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对政府提供服务 and 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研究相对比较少,我希望在这一方面提出一些我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经济发展回顾

经济发展有许多目标。显然,GDP是很重要的目标之一。GDP是关于收入的,除了收入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目标。世界银行1991年发表的《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发展的挑战是改善生活质量。生活质量的改善需要更高的收入,在贫穷国家中尤其如此。然而生活质量的改善还有更多的含义:包括更好的教育、更高水平的健康与

* 本文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白重恩教授在清华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中国和谐发展:产业·环境·制度”(2005年9月28日)的国际研讨会的发言稿整理而成。本文是作者近来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一些初步想法,更详细的阐述和论证将反映在作者正在进行的相关研究中。——编者注

** 作者对吴敬琏、青木昌彦、Lawrence Goulder、胡鞍钢、李稻葵、王小鲁、张春霖等与会代表提出的评论,对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韩超所做的整理工作,也对张再金所提供的研究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作者注

营养、更少的贫穷、更清洁的环境、更平等的机会、更多的个人自由以及更丰富的文化生活。”那么在这些目标上我们过去这些年取得的进展如何呢？

联合国开发组织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是能够综合反映这些目标的指标之一。这个指数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收入，第二部分是人的平均寿命，第三部分是教育。如表1所示，过去10年，我国人均寿命有所改善；在教育方面，从表2可以看到，15岁以上的成人文盲率不断下降，其中2000年的数字看上去有些不规则，文盲率看似有所回升，这主要是由统计方式不同造成的：2000年的数据是由普查得来的，而其他年份的数据是由抽查得来的。

表1 中国人均寿命

1990年	男	女
68.55	66.84	70.47
2000年	男	女
71.40	69.63	73.33

表2 中国15岁以上的成人文盲率

1998年	男	女
15.78	9.01	22.61
1999年	男	女
15.14	8.81	21.56
2000年	男	女
9.08	4.86	13.47
2002年	男	女
11.63	6.43	16.92
2003年	男	女
10.95	6.12	15.85

显然，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就。那么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占什么位置呢？钱颖一教授曾做过一些分析，在《财经》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阐述人类发展指数和GDP增长之间的关系，图1表明这两个指数是高度相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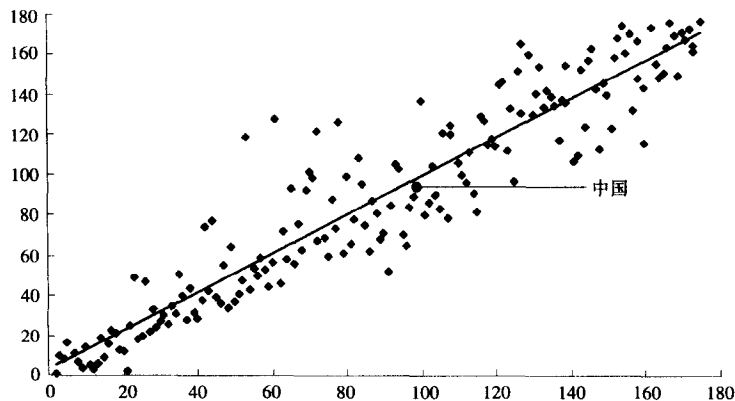


图1 人均GDP和人类发展指数相关关系

图中直线代表全世界各个国家中GDP和人类发展指数间的平均关系，中国基本在这条线上，略低一点。可见，我们如果用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经济发展，基

本上和GDP是相当的,并且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平均趋势之间没有多大的偏离。

如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中所说,国家发展包括众多目标,但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仅包括了收入、健康和教育因素,却没有包括贫穷,没有包括机会平等、个人自由和文化生活等因素。那么,在消除贫穷方面我们做得怎么样呢?表3为中国贫困人口状况。

表3 中国贫困人口状况

中国贫困人口(百万)	490	375	212	204
中国贫困人口发生率(百万)	51	33	17	16

注:根据世界银行计算办法,每天的平均收入在1美元以下者算作贫困人口。

1978年,中国50%以上的人口每天平均收入低于1美元,而在2000年这个数字已降为16%。2002年这个数字又进一步下降至6.9%^①。可见,中国在消除贫穷方面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根据国务院扶贫小组公布的数据,2004年贫穷人口的减少数在过去5年中是最多的。

收入分配问题

在收入分配方面,这些年中国基尼系数确实在不断增长。从0.31到最近的0.447,最新的数字为0.454。一般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以后,国家就越过了某种警戒线,是很危险的事情。但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地区间自然差距很大、城市化程度还很低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有其特殊性。

中国超过0.4的基尼系数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城乡差距。单独计算城镇人口的基尼系数为0.32,仍然低于很多国家。一些已经完成了城市化的国家,例如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4以上,德国和英国的基尼系数也分别达到了0.38和0.36,相比之下,中国城镇人口内部的收入分配状况尚属良好。

如果把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都控制了以后,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并没有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么严重。不考虑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异而只看总体基尼系数是不科学的。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世界上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是丹麦,它的基尼系数是0.247。另外一个基尼系数很低的国家是埃塞俄比亚,它的基尼系数是0.30,如果把这两个国家放在一起作为一个国家计算的基尼系数,几乎比任何国家都高。所以当

① 数据来源: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引用的胡鞍钢教授的演讲内容。

一个国家之内存在着非常大的城乡差距，存在着非常大的地区差距的时候，0.4以上的基尼系数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我国收入不均的趋势不断扩大也有其历史原因：我们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体。在计划经济之下，过度的平均主义导致了生产积极性与人力资源配置的低下。市场化程度增加后，收入差距必然增大。城市化程度远比我们高的另一转型经济俄罗斯的基尼系数是0.456。与之相比，我们的情况要更好。

但尽管如此，收入不均的趋势仍然值得重视。收入不均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机会的不均，一是分配结果的不均。机会的不均比分配结果的不均危害更大，它使机会缺乏者感到不公与无望，也严重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目前资源配置不均的最主要原因包括腐败、城乡差别，特别是受教育机会的差别。

中国目前对分配结果不均的研究比较多，但是对于机会均等的研究相对少得多。据我所知，很少有人研究社会的流动性，很少人能够告诉我们10年前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口，今天有多大的可能转变到平均水平以上。类似问题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的政策制定有很重要的意义。因此，在进行收入不均问题的研究时，应当把机会的不均和最后结果的不均等分开，目前这样的研究还很缺乏。

对收入不均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很多人谈的是效益和公平之间的取舍问题。但减少机会不均既可以改善公平也可以提高效率。这方面的工作应该加大力度。腐败是机会不均的一大因素，而政府对经济过多的控制为腐败提供了机会，是腐败的根源。为了减少腐败，应该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对腐败的打击固然重要，但只有减少腐败的机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在教育方面，尤其是初等教育方面，政府应该起到更大的作用，来保证受教育机会的均等。长期来看，普及教育是减少收入差距的根本手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改善分配结果的不均方面，确实有可能存在效益与公平之间的取舍问题，但我认为在讨论政策的时候，还要考虑另外一个取舍问题，就是今天的公平和明天的公平之间的取舍问题。因为某些要减少收入不均的政策，也会减缓经济的增长。如果这种经济增长的减缓会造成明天就业减少的话，这个取舍就不在于效率和收入公平之间，而是在于今天的公平和明天的公平之间。毕竟，增加就业是消除贫困、减少收入差距的最有效途径。因此，争取降低收入差距时，不光要考虑收入差距与效益之间的关系，也要考虑现在的收入差距与未来的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相关政策的分析

关于政策的有效性，我想从4个方面来讲。

1. 税收政策

在税收方面,中国前几年对农业税的减免无可争议,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但是目前个人所得税的状况是正式税率高度累进,实际税率高度累退。正式税率的累进度其实是比较高的,最高边际税率达45%。但是实际上收到的税和税率之间没有关系。中国所得税征收的有效性非常低。是应该坚持正式税率的高度累进性而实际税收没有办法控制,还是降低正式税率的累进性使征税变得更容易,实际税收的累进性变得高一点?这是值得思考的。

2. 补贴政策

除了税收政策,补贴政策也可以有效地减少收入不均。补贴有各种各样的手段,有价格补助、有金钱的补助,还有实物或服务的补助。单一价格补贴往往是最糟的政策选择,它带来严重的扭曲,而且其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可以用其他更有效的手段来替代。比如说燃油税或燃油价格。以前讨论燃油税时的一个反对说法是:采取单一的燃油税对农民的影响非常大,所以为了减少收入分配的差距,我们不应该征燃油税。现在国内汽油零售价格的上升比国际原油市场价格的上升慢得多,同样有人说如果汽油价格涨得太多,会对很多人的实际收入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有其他办法来解决这些收入分配问题,而不应该保持严重扭曲的价格,比如说发油票就是一个办法。可以给农民发油票,让他们凭票低价买油,而使其他用油的价格更接近市场的价格。这样既消除了价格偏离市场所带来的扭曲,也照顾了收入分配的问题。我几乎想不到有哪一种价格补贴,是不能够找到其他办法来替代其收入分配功能的。

关于实物或者服务补贴,最近的焦点在医疗卫生方面。现在关于医疗卫生有很多争论,其实是有点一边倒,即大家都认同过去的医疗制度改革是失败的。但到底怎么解决它?很多人认为“医疗改革市场化程度太严重”。

到底是不是过度市场化,这是我要讨论的一个问题。考察市场化程度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从供给方看,一方面要从需求方看。从供给方看,我认为医疗服务的提供方面的市场化很不够。医院之间没有多少竞争;药品的市场化不够,药品的供应渠道和价格都受到控制。保险方面,有人想买商业的医疗保险,但我们的医疗保险市场不发达,特别是保险和医院结合的部分。美国有卫生维护组织,就是保险公司拥有一批医院,他们可以对这些医院进行比较好的监管,使医院不乱开药、乱做手术。这个市场在中国是没有的。所以从供给方看没有形成市场。而从需求方面看,确实有很大的医疗支付是公共的支付,但公共的支付比较少,而私人的支付比较多。考虑医疗卫生市场化程度的时候,应该把这两者分开考虑。

有些人对欧洲某些国家的公共医疗制度非常看好,他们认为,德国的公共医疗

制度是最成功的。那么德国的公共医疗制度是什么样的呢？提供方是完全竞争的，即医院和医院之间要竞争，而支付方是政府。这好像和中国分别在对角线的两端上，在中国提供方没有竞争，而需求方是市场化的。到底中国的医疗制度应该是什么样的制度，是值得认真思考的。提到医疗制度，会联想到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政府提供福利受什么因素影响，什么条件下政府提供更多的福利，什么条件下政府提供比较少的福利？下面以医疗制度为例来看一看，政府到底在中间起什么样的作用，政府的作用受什么样的外界因素的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政府提供公共福利的成本和收益是什么。

提供福利的成本是什么？众所周知，提供福利是某种收入再分配的形式，只要有收入再分配，就会影响生产的积极性，会带来生产的扭曲，也存在一些政治阻力，这些政治阻力又会带来某些成本。什么情况下政府提供福利的这些成本比较高呢？如果收入分配非常不均，政府需要做的收入再分配就相当多。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带来的效益损失比较大，政治阻力也会比较大。在收入分配非常不均的条件下由政府来提供医疗服务对医疗发展也不利，因为所有人拥有一样的由政府提供的服务，就不会有人花钱发明政府不愿支付的新药品和新的医疗设备。所以政府提供福利的成本可能是随着收入不均程度的增加而增加，收入越不均，提供福利的成本就越大。

政府提供福利的收益是什么？如果收入非常不平均，政府提供福利的好处也很大。比如医疗，如果收入非常不平均，贫困人口完全无法自费享受医疗服务，他们唯一得到医疗服务的手段就是依赖政府提供。所以在收入分配非常不均的情况下，政府福利的收益是很高的，而收入分配比较平均的时候，收益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政府提供福利面临这样的问题，成本曲线随着收入不均程度上升，收益曲线也随着收入不均程度上升，这样结果就可能比较复杂。

考虑两个极端情况，一个是收入分配极端不平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不提供某种福利，可能有些人患病就完全得不到医治。所以在收入分配非常不平均的时候，政府提供福利的收益要高于成本。在收入分配很平均的时候，政府提供某些福利的成本比较小，因为它需要的再分配比较少，因而政治成本也比较小，消费者的需求也比较容易满足。从上面的收益分析得到这样的结果：在收入分配非常不均匀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提供一定的福利；在收入分配比较平均的时候，政府只需要提供较少的福利。介于这两种极端情况的中间时，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可能成本就要高于收益了。所以福利化程度与收入分配的不均程度之间应该是U型关系。

将两种极端情况分别和现实中的情况相对应。在收入分配非常不均的情况下，